



庐陵正气

吉安市纪委 吉安市监察局编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庐陵正气/吉安市纪委,吉安市监察局编. —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
2008.8

ISBN 978—7—210—03898—6

I. 庐... II. ①吉…②吉… III. 廉政建设—吉安市—
通俗读物 IV. D630.9—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1258 号

庐陵正气

吉安市纪委,吉安市监察局编

江西出版集团
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淮安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8 年 8 月第 1 版

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20.75

印数:3000 册

ISBN 7—210—03898—6 定价:28.00 元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: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邮政编码:330006 传真电话:6898827 电话:6898893(发行部)

E-mail:jxpph@163.net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欧阳修《泂岗阡表》碑



胡忠简公祠



杨万里的木雕板

文天祥纪念馆





曾山 1961 年回故居时所题对联



王恩茂将军



1983 年 5 月余秋里回家乡



坐落于万安博物馆前康克清塑像

本书编委会

主 任：李 云

副主任：彭水根 郭保全

成 员：刘宗彬 彭三元 李梦星 刘德清 萧东海
顾宝林 李 忠 陈 钢 黄惠运 曹 蕾
刘诗江 肖刚林 沈红兵 郭在芝 陈贞顺
张铁军 曾群州 刘景洪 罗伙根 邓志兴
傅江蓉 吴宇华 艾南昌 曹新平 陈新建
李键铭 熊俭生 曾玉萍 刘贤烽 罗洪标
邱 野 曾远龙 李义锋 王斌强 左卫清
尹晓忠 肖慧祥

前言

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之际,《庐陵正气》正式出版了,这是吉安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,可喜可贺。

铮铮铁骨万民钦,浩浩正气青史留。吉安,古称庐陵,位于江西省中部,素有“江南望郡”、“金庐陵”、“文章节义之邦”的美誉。庐陵自古人才辈出。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”这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老土地,千百年来,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清官廉吏、一代又一代胸存浩然正气的志士仁人,给庐陵子孙留下了许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故事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庐陵正气文化。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,无数吉安籍的革命先烈和广大井冈儿女为党、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,给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深深的启迪。

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,“坚持标本兼治、综合治理、惩防并举、注重预防的方针,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”。在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中,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的预防工作。因此,党的十七大要求,“加强廉政文化建设,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”。

近年来,吉安市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教育工作,在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家庭、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农村——“六进”活动中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,取得明显成效。几年的工作实践表明: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是健全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工程,也是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,更是实现新跨越建设新吉安的现实需要。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工作,必须紧密结合实际,创造独具特色的品牌,才能保持长久生命力和创造力;必须传承创新,总结历史文化中廉政文化传统,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;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党优良的廉政传统,赋予新的时代内涵,才能教育广大干部群众。为此,吉安市纪委、监察局充分收集、挖掘、整理具有代表性的吉安籍清官廉吏、志士仁人等事迹,以及吉安籍将军、红军、革命烈士等艰苦奋斗、清正廉洁的故事,组织编撰了《庐陵正气》。

《庐陵正气》一书,注重史实性和思想性,翔实可靠。编撰时,力求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读者,注重可读性和通俗性,寓教于读,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较强的教育意义,是一本适合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的优秀读物。

《庐陵正气》的出版,是吉安市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,深入挖掘庐陵文化中廉政文化资源,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良好载体和成功实践。它的出版填补了吉安市廉政文化建设中著述出版的空白,是吉安市廉政文化建设的硕果,在开展廉政教育、倡导廉政文化、弘扬社会正气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。希望广大党员干部,认真学习,弘扬正气,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,常修为政之德、常记贪欲之害、常怀律己之心,推进廉政文化建设,开展反腐倡廉教育,营造廉荣贪耻的良好氛围,将吉安市反腐倡廉工作推上新台阶,为实现吉安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。

是为序。

编委会

2008年7月

庐陵正气 根深叶茂

正气,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境界,指的是刚正的志气与节操,包括忠贞、刚直、清正、正派、仁爱等含义。关于正气的概念,由来已久。屈原说:“内惟省以端操兮,求正气之所由。”(《楚辞·远游》)意为通过内心反省端正操守,以求得正气。《淮南子·铨言训》中说:“君子行正气,小人行邪气。内便于性,外合于义,循理而动,不系于物者,正气也;重于滋味,淫于声色,发于喜怒,不顾后患者,邪气也。”此语提出了君子与小人,正气与邪气的区别,立场鲜明。孟子说: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其为气也,配义与道,无是馁也。是集义所生,非袭义而取之也。”这种具有道德属性的“气”,只能靠道德修养来充实它,于是又说:“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这“至大至刚”的“浩然之气”,学者们认为就是“正直之气”,即“正气”。

做胸怀正气的君子,是历代先贤的人格追求,也是对从政者的道德要求,孔子说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孟子说:“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。”(《孟子·万章》)其意为我没有听说过自己不正而能使别人正的。荀子说:“师以身为正仪。”(《荀子·修身》)先贤们关于做人、从政要有“正气”的论述,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精华,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健康发育和成长,产生了十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。

自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在征讨岭南时设立庐陵县(位于赣江中游的吉安)以后,凭借南北黄金水道赣江的便利交通,庐陵经济文化逐步发展。汉末以后,中原战乱频发,人民流离失所。尤其是西晋的永嘉之乱、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北宋的靖康之乱,迫使北方的百姓一批又一批地南迁。土沃林茂又相对安宁的赣中庐陵地区,陆续迁入了一代代北方居民。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,也带来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原文化,并注重传播和光大。唐代的贞观年间,在吉水就创办有皇寮书院,是我国最早私人创办的书院之一。还有同朝稍晚开办的泰和匡山书院、吉水登东书院、庐陵光禄书院和宋代以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一大批

教育场所,大多为祖籍北方的乡绅和外籍地方官吏所办。发达的书院、学舍教育加速了中原文化的传播。以孔孟学说为主导的儒学思想,尤其是其中忠正刚毅的人格精神,经一代代名儒大臣的传扬教化,深深地扎根于庐陵大地。

颜真卿,陕西人,封鲁郡公,人称颜鲁公,是唐代中期声名显赫的忠烈名臣和大书法家。他曾因忠谏得罪了权臣,于唐永泰元年(765)被贬到吉州任司马之职。他在庐陵城乡广置书馆学舍,以传播正统的儒学为己任,得到了士民的拥戴。他离任后,庐陵人建颜鲁公祠以纪念。庐陵名儒欧阳守道在为该祠所写的祭文中道:“鲁公事君有犯无隐,愠于群小,之死不回,……鲁公八十元老,殁于贼手,高风劲节,谁其俪之……以鲁公为此,此州俗化,受鲁公赐多矣。”颜真卿不依附权贵,刚正坚毅,遭挫折而不屈服的节操,为庐陵人所敬仰,深刻地影响着后人。

宋代兴起的理学,是孔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,认为“三纲五常”的封建秩序和道德合乎天理,特别强调忠贞不二、保持节操、刚正不屈的观念。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,在庐山办濂溪书院进行理学启蒙。他到过庐陵不少地方讲学。如在较偏僻的万安县山区,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,于宋淳祐元年(1241)兴建了濂溪祠,后改为书院。周敦颐所颂扬的荷花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高洁品格,给庐陵人以启迪和教育。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,足迹遍布庐陵,从峡江到遂川,都留下了他传经布道的声音。程朱理学极力推崇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,借助发达的书院教育,在庐陵盛行。两宋时期,在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下,庐陵涌现了灿若明星的文化名人。他们恪守“刚健有为,自强不息”的积极人生态度,忧国忧民,胸怀天下,保持高洁的操守和气节,屡受挫折和磨难而不屈不挠,闪烁着人性的光辉。位于丞相之位的永新人刘沆、吉安县人周必大是这样,一代宗师、任过参知政事的永丰人欧阳修、新干县状元何昌言、吉水县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是这样,民族英雄文天祥更是达到了顶峰。于是,庐陵有了“文章节义之邦”的美誉。

明代中后期,称作新理学的阳明心学,成为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思想理论,强调人的主体性、能动性,提出“心外无物”、“知行合一”等观点,其“致良知”说特别注重人的内心修养,认为丝毫不能放松道德约束,不能让心为外物所诱惑和干扰。王阳明曾任庐陵县令,传播其“致良知”的心学理论。庐陵一批儒士文臣,追随这位大师。王阳明去世后,众多的庐陵王门弟子,在家乡办学校,开讲会,传承和弘扬师说。每年春秋两季,吉州九县和邻郡的文士们,齐聚青原山,研讨阳明心学,省外的王门后学们也前来赴会,庐陵成为当时的学术

交流中心,涌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思想家。如安福的邹守益、泰和的欧阳德、吉水的罗洪先、永丰的聂豹等。他们既是朝中大臣,又热衷于在家乡讲学传道,把提高道德素质为宗旨的心学理论,传播民间,促进了庐陵文化继宋代之后的再度繁荣。以敢言直谏著称的吉水人解缙、致力于强国富民的内阁首辅泰和人杨士奇、安福人彭时、状元名臣吉水人胡广、唯物主义思想家泰和人罗钦顺、经济改革家庐陵人周忱等先贤,都是正气凛然的士大夫,其高风亮节为代代称颂。

儒学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在庐陵世代传播,代代积淀,培养出了一批批忠义刚正的志士仁人;而他们又以模范的行为,影响和带动了更多的士民百姓,使之形成一种良好的传统和风气,这就是持正义、走正道、尚正气,代代沿袭和发展,成为吉安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、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,在民族文化史册中,闪现出夺目的光辉。

忠贞爱国、刚正不屈的精神是庐陵正气的灵魂

千百年来,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庐陵先贤们,信奉“天下为公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、“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的观念,以天下为己任,忠于祖国,以国耻为己耻,以国荣为己荣,自觉地把个人命运同祖国、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。为了大义,可以忍辱负重,可以舍生忘死,可以无怨无悔,铸成了民族精神的丰碑,谱写了正气浩然的华章,也形成了庐陵先贤比较鲜明的思想和人格特征。庐陵先贤的杰出代表、民族英雄文天祥,吸取了孟子“浩然正气”的精髓,以“配义与道”的正气压邪气,渡难关。他不幸被俘后,威逼利诱不能使他屈服,土牢中污浊的“七气”的磨难没有使他倒下,因为他身上有股与天地并立、万古长存的浩然正气。正如他在《正气歌》中所说: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,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。于人曰浩然,沛乎塞苍冥……是气所磅礴,凜冽万古存,当其贯日月,生死安足论。”胸存正气,就无所畏惧,坦然面对生死。难能可贵的是,文天祥超越了前贤。他所推崇的正气,不仅是指如屈原等所说的统帅人主观意识的精神力量,也不仅是孟子所说的“配义与道”的日常道德观念,而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,主要是指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,是至高无上的大义。他在《正气歌》中列举的12位历史人物,都是具有民族气节的英杰和威武不屈的忠烈之士。文天祥认为,他们所具有的正气,是最高尚的、最有价值的。

同时,文天祥还极力推崇始终如一、永不变心的爱国信念。他在《正气歌》

中道：“皇路当清夷，含和吐明庭，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”就是说一个人胸中要长存浩然正气，在天下太平时，它会很平和地表露出来，为国家的政治清明发挥作用；当国家危难之时，它就会突显出来，表现出坚贞的气节。也就是不管何时何处，都要忠于祖国，至死不渝。文天祥是在具有崇尚正气、忠贞爱国优良传统的地方文化沃土中成长起来的，他又以自己的言行，把庐陵正气推向了高峰。一代代的庐陵先贤，以坚定不移的爱国信念，以百折不挠、宁死不屈的精神，谱写了一曲曲雄浑的人生乐章。

在民族面临危亡或者国家整体利益受到侵害时，庐陵先贤义无反顾，奋勇当先，敢于舍弃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。尤其是在抗击外族入侵者时，舍生忘死，显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。北宋末年，金国威迫宋朝廷割让山西与河北三个州，否则，进攻京城。宋皇吓破了胆，大臣们纷纷建议割地求和。庐陵永和人欧阳珣联合9人上书反对，并提出抗敌之策。宋皇不听忠谏，竟派欧阳珣任监丞，同金国使者去深州办理割地手续。欧阳珣知道是权奸借刀杀人，仍愤然前往。到了深州，他公然违抗君命，拒办手续，金人强逼，他不屈从；金人把油脂浇到他身上，将他活活烧死。吉水人杨邦乂，在金军进攻江南、南宋皇帝和大臣们拼命逃亡之时，率孤军坚守南京城。城破被俘，金人用尽诱术，杨邦乂誓不投降，咬破手指写下“宁作赵氏鬼，不为他邦臣”的血书。金人恼怒，割掉他的舌头，又将他剖胸剜心。在抗击元军的战争中，永新县的一支义军，被元军围困在永新城外的山里。3000多名义军将士无一投降，前赴后继，全部跳入深潭中壮烈牺牲。后人建祠祭祀，该潭称作“忠义潭”。还有为抗击清军而在赣州城中自焚殉难的遂川人郭维经、起兵抗清历经艰险的安福女英雄刘淑英等庐陵人，为保家卫国而不惜个人的一切，其崇高的精神辉映河山。

在国家相对和平的时期，庐陵先贤们仍抱着对祖国忠贞不二的态度，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，或心怀忧患意识，犯颜直谏，与有害于国家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，不计较个人的福祸安危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往往不被昏君和权奸所容，受到迫害和打击，但仍不屈不挠，无怨无悔，以凛然的正气名垂史册。欧阳修在仕途上奔波了40余年，三起三落，都是因为心忧天下，直言弊政，得罪权奸，而屡受磨难和诬陷，但忠心为国的信念从未动摇。庐陵值夏人胡铨，坚决反对秦桧卖国求荣，首倡杀秦贼以谢天下，誓不与之共戴天，被两次流放共23年，回朝廷后仍力主抗战，与主和派斗争到底。新干状元何昌言，先后5次弹劾陷害忠良的“六贼之首”蔡京，5次被免职或降职，仍然毫不气馁地与奸贼斗争。遂川的孙逢吉在南宋朝廷当谏官，曾70天上奏20次，弹劾为非

作歹的官员,其中包括皇亲国戚。明代的吉水人邹元标、安福人李时勉、刘球等,都是以直谏闻名朝野的大臣。他们虽因此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,甚至不幸,但其为国为民赤胆忠心的精神,如日月照千秋,树立起庐陵正气的一座座丰碑。

操守高尚、清正廉洁的人格风范,是庐陵正气的精髓

操守是人们平素所执持的志行品德;人格,是做人的规格或标准。操守和人格,都有高低和优劣之分。在我国的儒家文化中,十分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,即有意识地创造人们共同景仰的人格范型,引导人们攀登崇高的道德目标。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,有圣人、仁人、大丈夫、君子等,都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典范。在儒学思想浸染深厚的沃土中成长的庐陵先贤们,孜孜追求高尚的操守和理想人格,力求做孟子所说的“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”、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“大丈夫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;做孔子所倡导的“明明德”、“修己以敬”,有修养、有道德、有志向的“君子”。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,经名士垂范,代代积淀,辐射流传,深刻地影响着乡风民风,形成了古庐陵的一种道德风尚。通俗的说法就是堂堂正正做人,清清白白做官。

追求理想人格的庐陵先贤们,有着共同的思想道德特征。可用两个字来概括,一是正,二是直。这“正”,包括持正义,走正道,做正事,为人正派,为官清正等。这“直”,指的是正直、直率、硬直等。有人评述为“只论是非,不计利害”,指的是对人对事,只看你是不是符合正义和正道;如不符合,就直言不讳地指出,不会考虑本身的得失进退。而对自己,则以君子的道德来约束言行。庐陵先贤的正直在历史上是有名的。宋明两代,庐陵籍的大臣在朝廷任要职的较多。宋代有4位宰相;明代至少有11位在内阁任职,行使相当于宰辅的权力,其中有4位为首辅;至于尚书、布政使之类的“省部级”官员不止百人。他们有的参与国策的制订,有的是君王的左右手,有的掌握了财经和生杀大权,有的是封疆大臣,都是堂堂正正的谦谦君子,鄙视阳逢阴违、摇尾乞怜、奴颜媚骨、得意忘形、见利忘义的小人。他们坦荡正直,自尊自爱,维护人格尊严,胸存君子应有的刚毅正气,其不变的高尚操守和品性,像《吕氏春秋》中所描绘的那样“石可破也,而不可夺坚;丹可磨也,而不可夺赤”。

一是崇尚正义。许多庐陵先贤都是以直谏和刚正闻名的。吉水人解缙,因

为敢于大胆说真话实话而受到明初三代皇帝的器重,使奸小之徒胆寒。他写的《大庖西室封事》和《太平十策》等奏章,都是直指朝政的弊端,提出纠弊的建议;他敢当面回答皇帝的提问,中肯地评点当朝权臣们的是非优劣。明代安福人刘球,看不惯大权独揽的宦官头目王振为非作歹。在群臣慑于其淫威,不敢对其发动对外用兵的做法提出异议时,刘球挺身而出,向英宗上《边防事宜疏》,反对王振的行为。后又上疏提出君主应“权不下移”,以防奸臣作乱。王振震怒,将刘球逮入狱中并秘密斩首。据史载,刘球头落地而身不倒,吓坏了刽子手。解缙和刘球等一批庐陵直臣,虽然有的受到陷害致死,但其崇高的人格精神,正如唐代诗人孟郊所颂:“镜破不改光,兰死不改香。”

二是坚持正道。在尔虞我诈、错综复杂的官场上,庐陵先贤们坚持道德操守,以自己的品行和才智来获得地位和荣誉,不喜欢,也不善于去钻营为官之道,以人身依附、见风使舵、曲意逢迎为耻,光明磊落地处世行事。即使因此而使仕途受阻,也不愿改变立场,放弃做人的原则。罗洪先中了状元后,在朝廷任职的时间没几年,借故守丧等事,闲居在老家。主要原因是当朝的权奸结党营私,禀性正直的罗洪先不愿与之伍。朝廷多次催他返京,他只好遵命,又因上书劝谏世宗不要沉迷道教而被削职为民,回家乡钻研传播理学。权力熏天的内阁首辅严嵩很欣赏罗状元的才华,想把这位江西同乡招入圈子里,便写信给他,请他回京任要职。罗洪先不愿投靠这位众臣巴结的首相,回书答道“愿毕生老于林壑之间”。明代正统年间,新干的陈寿在户部任职,皇帝宠妃万氏的兄弟万通,涉嫌贪污受贿,朝廷派陈寿去查处。万贵妃特地嘱托他关照,例行公事调查一下就行,她会打通关节摆平。这本是个讨好贵妃的良机,可陈寿不买账,把万通违法的事查得清清楚楚,并提出处理的意见。好友劝他不要将结果公示,他却如实禀报朝廷。万贵妃嫉恨陈寿,借机报复。陈寿虽然一时受屈,但坚持原则的风范受人称赞。明代状元吉水人刘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,内阁执政的两个大臣,嘱托他关照一下他们参加考试的儿子,录取时名次排前一点,以便有资格参加礼部会试。刘俨说,他只按规定主考,录取以成绩而定。录取名单公布后,两个大臣的儿子均落榜。两个大臣很不高兴,怂恿皇帝复试,命别的考官评卷,结果他们的儿子仍落选。刘俨不徇私情公正主考的精神,得到了众臣的好评。如此事例,在庐陵先贤中不胜枚举。

三是身正清廉。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,要求从政者品行端正,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、义与利的矛盾,提倡奉公尚忠,不假公济私,更不能损公肥私;在义与利的关系上,要按孔子所说的“见利思义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去对待;在金钱

和物资的诱惑前,要像孟子所说的“可以取,可以无取,取伤廉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以及如荀子所说“以义制利”去行事为人,以见利忘义、贪赃枉法为耻。庐陵先贤们正是如此,以道义为上,为重;不苟取,不妄得,形成了“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”的高洁品德。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官场上奔波了30多年,一直视富贵为敝屣。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,他掌管了大量财物。任满离职时,有余钱万缗。他一文不取,全弃之于官库。他做京官时,预先准备好了回家的盘缠,锁在箱中,告诫家人不许置物,以便离职时轻装上路。当时的诗人徐玑在《投杨诚斋》诗中称之为“清得门如水,贫惟带有金”。他的儿子杨长孺等后人,传承了清廉的家风,深受人们赞许。明代安福人刘戡,奉命出使交趾(今越南)颁诏扬国威。以往出使南洋一带的大臣,总会在船上捎些货物沿途做点生意,自己也带些私货。刘戡对这种做法很反感,认为有损使臣的尊严。他只带几个卫士和仆人,走陆路前往。到了交趾,办完事就立即回国。交趾的国王以为接待不周,得罪了使臣,便命人送了包金银珠宝给刘戡,他谢绝了;国王又派人在途中给他送礼物,他坚持不受。国王深受感动,在给明朝廷的谢表中,称“廷臣清白”,并在边界的驿道上建了座“却金亭”来颂扬刘戡的清廉。明代任内阁首辅20多年的泰和人杨士奇,是两代皇帝的老师,曾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可他从未得意忘形,更不以权谋私,甚至按朝规可享受的待遇也尽量推辞,如谢绝皇帝给他修缮住所和在老家建房赐田等。他奉公清廉的操守,赢得朝野臣民的敬重,这也是他立于四朝均受君王倚重的重要原因。清代遂川人周垞,在彰德府任职时,府属的各盐商,按惯例赠送享银250两给他。以往的官员认为这是常见的人情交往,都会收下。而周垞觉得收了便不利于秉公执政,就将赠银转给安阳的知县,嘱他用此款去修缮一处名胜。壁立千仞,无欲则刚。庐陵先贤们遵循这一人生格言,以清廉的道德操守立身处世。千百年间,庐陵籍的大臣要员,在仕途上有浮有沉,历经坎坎坷坷,大多是因忠正直谏或政见不合而受贬谪或受牢狱之苦,甚至家破人亡;几乎没有一人是因贪赃枉法、徇私谋利而受到国法惩治的。他们所受的冤屈,基本上都得到了澄清和平反,往往还会受到重新褒奖。

勤政爱民、心系百姓的情怀,是庐陵正气的根本

从政者是高高在上、颐指气使,以“父母官”自居,视百姓为草芥;还是勤勤恳恳为百姓服务,为“草根”效力?这是立场问题,也是道德问题。眼中只有君

权,漠视民生的为政者,往往是唯利是图,心胸狭窄的人;而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,为民众的苦乐倾注真情的人,才是胸怀宽广,坦坦荡荡的君子。因为他在勤恳为民的实践中,获得了精神的愉悦和支持的力量,使得他的腰更硬了,气更壮了,思想境界也更高了。庐陵先贤们正是如此。他们大多数出身于社会底层,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亲身体验;他们又深受儒家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”(《尚书·五子歌》)、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、“国以民为基,贵以贱为本”(东汉王符《潜夫论》)等“民本”思想的教育和影响,在从政的过程中,关心民众疾苦,并竭力为民伸张正义,谋取利益。虽然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,他们无法实现“大同”和“民主”的理想,但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,为民着想,为民做主,以求百姓安生,以求社会安宁。南宋任过左、右丞相的周必大,多次提醒君皇要“爱民如子”。孝宗即位不久,四川屡遭灾害,饿死了一些人。饥民们聚众闹事,朝中有的大臣建议派兵去镇压。周必大力排众议,认为百姓是因贫穷而闹事的,不能强压,应下诏安抚,并放宽田赋征收日期,重灾区减免。孝宗采纳了他的意见,果然不久就平息了事态。在另一年水灾之后,朝廷拨付的赈灾款不足,周必大提议压缩皇宫的开支赈灾,并号召京城富商高官捐资赈灾,有力地缓解了民困。明代著名的理财名臣周忱,在任江南巡抚的20多年里,采取了“平米法”,开设“济农仓”,压制豪强猾吏等措施,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,使江南以往“人厌为农”转变为“人乐为农”,以致“民不忧而廩有余羡”。百姓称周忱为“周青天”。他离任后,人们建生祠来纪颂这位爱民的好官。五代时泰和的周炬,曾任监察御史,他见家乡螺溪大片农田受旱严重,便出资修筑槎滩、碛石两陂,提高水位,开挖水渠36条,并立下族规,此两陂不得专利周氏,应供应下游田地。还买下山地为维修水陂永久筹资。此陂至今仍造福吉、泰两县百姓。只有心中装着民众的人,才不会斤斤计较着一己私利。“心底无私天地宽。”谋取百姓的共同利益,是一腔正气孕育和生长的根本动力。

庐陵先贤还从儒家所推崇的“仁爱”思想中得到滋养,努力实践孔子所说的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和孟子所云: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、“仁者爱人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的理念,同情和关心他人,帮助和救助弱者,为百姓分忧解难,与恃强欺弱、鱼肉百姓的邪恶势力斗争。这种利人济世、博爱大众的传统道德,是人间正气的重要支柱之一。北宋丞相刘沆,嫉恶如仇。有个叫张怀信的内侍是章太后的宠臣,负责督建一宗教场所,调集大批民工运料做工。此人仗势扬威,时常鞭笞棒打

民工和下属官吏,人人畏之如虎,敢怒不敢言。时任大理寺评事、舒州通判的刘沆,大胆为民请命,经调查核实后直接上书给皇帝陈述其劣迹,朝廷罢免了张怀信的监工之职,并给以训诫,使民工们松了口气。清代庐陵县钓源村的欧阳衡,是个传奇式的人物。他任宁国知府时,有一豪绅强占贫民的山地为坟山。欧阳衡接到申诉后把山地判还给贫民。豪绅打通关节把欧阳衡的官给免了,新任的知府又把山地判给了豪绅。欧阳衡不满豪绅欺压贫民,便回钓源筹集了大批银子进京活动,并找任京官的堂兄帮忙,夺回了知府的官衔。他复任后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再将山地判还给贫民,并治豪绅强占之罪,了却心愿后,辞官回乡了。他情倾百姓,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,传颂至今。宋代遂川人郭孝友,任两广提点刑狱时,严察伤民扰民行为,弹劾一批贪官污吏,纠正冤案数十起。他离职回乡后,发现地方政府招募的弓箭手,名曰维护治安,实际上多为地痞无赖,和盗贼狼狈为奸,有时以借办公事的名义敲诈勒索,百姓苦不堪言。郭孝友调查核实后专程回京向朝廷汇报,建议整肃地方治安队伍,取消招募弓箭手,得到批准,为百姓除去一害。阅读吉安地方史料,可见到许多名士贤达为民办实事、做好事的事例,如主持公道平民冤,捐资献物解民困,出谋献策助民富等等,化成了一股股仗义行善的人间正气。

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大环境和多种思想观念交错的历史条件下,形成发展的庐陵正气,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印记,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。但其中顺应历史发展潮流,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优秀成分,则会一代代地传承和弘扬,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,在不同历史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。20世纪之初,当中华民族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领土、民不聊生、军阀混战的重重灾难之时,吉安的一批热血青年,在共产主义旗帜的召唤下,积极参与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。他们像庐陵先贤那样,把国家的危亡、民族的利益当做“大义”,不顾个人的“小利”,勇敢地追求探索救国救民之路。如组建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的泰和人袁玉冰、领导万安暴动的曾天宇、组建吉安第一个中共党组织的罗石冰、建立吉安农村第一个农民协会的曾延生、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赖经邦和永新县的欧阳洛、新干县的邹努等革命先驱,传承了庐陵先贤崇高的“舍生取义”的精神,为民族的整体利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吉安的共产党人,面对白色恐怖,“唤起工农千百万”,燃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烈火,一大批志士投入到推翻旧社会的红色革命洪流之中。他们的一腔热血,流淌着庐陵先贤们的志气、骨气和豪气,以一身的正气谱写着革命者的碧血浩歌。在波澜壮阔的九打吉安的战斗中,在井冈山、湘赣、赣西南等革命

根据地艰苦卓绝的创建和保卫进程中,在第一、二、三次反“围剿”的枪林弹雨中,朱德、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和吉安地方武装以及革命群众,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,不怕艰难险阻,不惜抛头颅洒热血,前仆后继,一往无前。5万多位为国捐躯的先烈,曾山、陈正人、康克清、贺子珍三兄妹等一大批老红军,以及147位共和国的将军,无一不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,无一不是铁骨铮铮的勇士。他们对祖国、对人民的忠诚,面对挫折而百折不回的斗志,坚定的理想信念,是庐陵正气优秀成分的传承,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,升华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更高境界,焕发出了新的光辉,融入了被誉为“中国革命精神之源”的井冈山精神之中。

(李梦星 中共吉州区委宣传部)